

孟子「知人論世」、「以意逆志」 與杜詩解讀

蔡志超

慈濟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提 要

孟子的「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兩說是傳統古典詩學中重要的議題，古人也時常藉由「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作為詮釋杜詩的主要進路。然而，在杜詩學中，目前學界較少探究這兩說與杜詩解讀間的關係。由於筆者關注杜詩詮釋的問題，因此本文嘗試探究此論題。

本文主要是試圖探討孟子「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兩說與杜詩解讀間的關係，考查「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在杜詩詮釋上的應用與實踐。古人解讀杜詩多揭櫫孟子「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兩要法。若就杜詩的屬性而言，一方面，杜詩因為多敘及時事，因此杜詩往往可加以繫年，進而編定杜甫年譜，透過杜詩繫年與年譜的編定，使讀者得以知其人、論其世，提供更為整全的訊息以解讀杜詩，此即「知人論世」的應用。另一方面，杜詩中的情志與宗旨本是讀者解讀的對象；可是杜甫也講究詩法，而此詩法往往也是讀者解讀作品時須揣度迎合的對象，此即「以意逆志」的實踐。那麼，杜詩繫年與年譜的編定是「知人論世」的具體落實；除杜詩主意外，杜甫詩法的探究乃是「以意逆志」內涵的新方向。

關鍵詞：孟子 知人論世 以意逆志 杜詩 解讀

孟子「知人論世」、「以意逆志」 與杜詩解讀

蔡志超

慈濟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孟子「知人論世」說

孟子曾在〈萬章〉篇提出「知人論世」說，書云：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①

這是說：一鄉之善士當與一鄉之善士交朋友，若以與一鄉之善士交朋友為不足，則與一國之善士交朋友；一國之善士當與一國之善士交朋友，若以與一國之善士交朋友為不足，則與天下之善士交朋友；天下之善士當與天下之善士交朋友，若以與天下之善士交朋友為不足，則與古之善士交朋友。既欲與古之善士交朋友，則又進而上論古之善士。然而後世之人如何能論古之人呢？藉由頌讀詩書的方法，然而，頌詩讀書不可不知其人，因此須論其世，這就稱為「尚友」——進而上與

①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大化書局，1982年），卷10下，頁2746。此中，「尚」字的解釋，朱熹說：「『尚』，上同。言進而上也。」見《四書章句集註》（臺北：鵝湖月刊社，1984年），頁324。

古之善人交朋友。

說明如下：一、這段文獻乃強調與善士交友的自我提昇進程。二、論（定）古之善士的目的是爲了與古之善士交朋友。三、論（定）古之善士的方法乃在頌詩讀書。而頌詩讀書又須知人、論世。亦即：頌詩讀書須知其人，而知其人須論其世，因此頌詩讀書須論其世。那麼，頌詩讀書的條件當是知人、論世。此中，知人又以論世作爲必要條件。

然而，歷來對《孟子·萬章》此段文獻中「世」字的解讀不同，倘若以作品內外作爲分類依據，那麼「世」字有兩種相異的詮釋：作品之內古人所處的時世與作品以外古人所處的時世。^②

首先，就作品之內古人所處的時世言，譬如明末黃宗羲〈一鄉之善士章〉下即曾說：

古人所留者，唯有詩、書可見。誦詩、讀書，正是知其人、論其世者，乃誦讀之法。古人詩、書不是空言，觀其盛衰以爲哀樂，向使其性情不關於世變浮沈蟬晷，便不可謂之善士矣，非既觀其言，又考其行也。^③

古人已逝，後人如何能與古之善士爲友呢？或者取法古人呢？只能觀古人遺留下來的詩書。黃宗羲強調：頌詩讀書就是知其人、論其世，這是因爲頌讀古人詩書乃是觀詩書之中，古人隨時世之盛衰而表現出的哀樂之情，因此頌詩讀書就是論世知人。此中，古人所處的時世（世）與其性情哀樂的變化（人）有密切關係。反之，倘若作品中古人之性情哀樂不關於世事變化與人生境遇之起伏升降、祿位短長，就不可稱爲善士，此即所謂「向使其性情不關於世變浮沈蟬晷，便不可謂

② 關於「世」可指「作品之外」與「作品之內」兩種不同見解的歸納，首見林維杰〈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朱熹對《孟子·萬章》篇兩項原則的詮釋學解釋〉一文，詳《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期（2008年3月），頁111-114。是文有詳細的分析討論暨文獻舉證。

③ （清）黃宗羲：《孟子師說》，見《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203冊，卷下，頁228。

之善士矣」。值得一提的是，此處的「世」不僅指古人時世，亦含涉作者一世。歸結而言，「世」指作品中古人所處時世，也略及古人一生；「人」指作品中之古人。^④最後，黃宗羲肯定「知人論世」為頌讀作品的方法，並且，頌讀乃是觀作品內世與人間的關係。

其次，就作品之外古人所處時世言，譬如漢·趙岐即曾說：

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⑤

趙岐認為：由於後之讀古人書者須知古人之高下（知人），倘欲知古人之高下則須論古人時世以別之（論世），因此後人須論古人所處時世並加以區別辨識。那麼，知人與論世間有著密切的關係，「論世」實是「知人」的必要條件。此中，「古人高下」乃是以古人所處時世來加以區分辨別的，它的關鍵在於作品以外好的時世，所謂「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然而古人高下與古人所處時世是否有關，這恐是值得斟酌的問題。無論如何，趙岐在此揭示解讀作品可以藉由作品以外古人所處之時世，作為解讀作品的資源。

又如清·吳淇於《六朝選詩定論》亦曾云：

古人有詩、書，是古人懸以其人待知于我；我有誦讀，是我遙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徒誦其詩，當尚論其人。然論其人，必先論其世者，何也？……。苟不論其世為何世，安知其人為何如人乎？余之論選詩，義取諸此，其六朝詩人列傳，倣知人而作，六朝詩人紀年，又因論世而起云。^⑥

④ 「作品中之古人」主要是指該作品之作者。然而如果進一步反省，有時當亦可以包括作品語言所描述或影射之人，譬如結交友人與諷譏對象，讀者由此亦可明瞭作者的性情為人。

⑤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卷10下，頁2746。

⑥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第11冊，卷1，頁50。

吳淇以爲：由於誦讀詩書是後代讀者以其閱讀古書的認識理解以求於古人之志（以意逆志），所以誦詩讀書應當還要討論古代作者之爲人。而討論古代作者之爲人須先論定其所處時世，這是由於倘若不先論定古代作者身處哪一時世，又如何能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人呢？因此，誦讀詩書必須先論定古代作者所處時世（知人論世）。吳淇在此強調誦讀詩書不能僅僅止於誦讀作品自身而已，讀者進一步須超越作品，討論作品以外的古人，以及作品以外古人所處時世，具體方法乃是撰作「詩人列傳」與「紀年」。吳淇此處明確指出「知人」中之「人」是作品以外的古人，而趙岐論述裡「知人」中之「人」是否明指作品以外的古人，則較難以判定。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吳淇認爲「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兩者間有緊密聯繫，閱讀作品時「知人論世」是「以意逆志」先決要件。

歸結而言，「世」若可指作品內古人所處的時世與作品外古人所處的時世，那麼孟子「知人論世」說即可分爲兩種：一是從作品內來「知人論世」，這討論作品內作者與其所處時世；^⑦二是從作品外來「知人論世」，這討論作品外作者與其所處時世。上述這兩種是分別從作品內外來歸納查考作者其人與其世。具體的落實即是對作品進行繫年，進而編纂年譜，以提供解讀作品的資源。

最後，就實際作品繫年與編定年譜而言，從作品內與作品外來知人論世都是同等重要，無法偏廢，並非僅著重作品內所提供的訊息，而忽略作品外的資訊；反之亦然。通常是利用作品中的訊息來作爲繫年的重要依據，然而繫年有時也會酌參作品外的史書、筆記、地志與他人著作等等，兩相查核，考訂辨證，對作品進行正確的繫年。其後，再藉由繫年的結果來編定年譜。依此，刻意區別從作品內或外來「知人論世」的意義恐怕不大，作品內外的「人」與「世」實同樣重要。

二、孟子「以意逆志」說

孟子曾在與咸丘蒙的對話中提出了「以意逆志」說。兩人整段對話裡，咸丘

⑦ 惟需說明的是，這須排除虛構寓言等作品。

蒙主要有兩個疑問：一、舜成為天子之後是否曾以其君（堯）為臣，使北面而朝？孟子否認說：堯年老時，舜只是代理天子職務，所謂「堯老而舜攝也」。據此，舜不會以堯為臣，所謂「舜之不堯臣」。二、舜成為天子之後是否曾以其父（瞽瞍）為臣，使北面而朝？咸丘蒙的想法是：舜成為天子之後，瞽瞍即為百姓；進而援引《詩經·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諸語，用以說明：天下百姓皆為天子之臣民，因此瞽瞍當為舜之臣民。瞽瞍既為舜之臣民，那麼瞽瞍當亦北面而朝舜。若是，則舜於其時曾以其父瞽瞍為臣民⁸。如此，舜處於政治與家庭上的尷尬為難。然而此時孟子質疑咸丘蒙援引的證據，認為他的援據違犯了斷章取義之弊，書云：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⁹

咸丘蒙割裂〈北山〉前後詩句，僅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諸語作為論述的前提，未顧及作品前後的脈絡與詩人創作的情志，而「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導致斷章取義的詮釋之誤。針對這個問題，孟子認為〈北山〉詩的詮釋當是：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非王土，莫非王臣，莫非王事。既是王事，卻獨我勞於王事。勞於王事，而使我不得奉養父母（所謂「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認為倘若欲免於

⁸ 《韓非子·忠孝》亦有相關記載，書云：「《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72冊，卷20，頁182。

⁹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卷9上，頁2735。

咸丘蒙這種截斷取義的讀詩方式，則說詩者當「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要避免不顧及作品前後脈絡及詩人創作情志的讀詩方法。那麼，是否有進一步更積極且具體的詩歌詮釋方式呢？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讀詩途徑。^⑩

然而，歷來學者對於「以意逆志」的解讀也不相同，若以詩歌作品的內外作為分類依據，那麼「意」字可以有兩種理解：讀者之意（學者之意）與作者之意（詩人之意）。^⑪

首先，就讀者之意（學者之意）言，譬如趙岐詮釋孟子「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這段文獻時曾說：

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⑫

趙岐認為孟子的「以意逆志」是指「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而「己之意」即「學者之心意」，那麼「以意逆志」就是以學（詩）者之意逆詩人之志。比較特別的是，趙岐進一步說明：何以後代學者能夠以其意來逆前代詩人之志呢？或者，何以後代學者的意能夠逆前代詩人之志呢？這是由於閱讀時後代學者的意可以相通

⑩ 曾守正〈孔孟說詩活動中的言志思想〉說：「孟子所提出的說詩方法，可以分為消極原則與積極原則。消極原則就是『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而積極原則為『以意逆志』。」見《鵝湖月刊》，第25卷，第6期，總號第294，頁10。

⑪ 關於「以意逆志」的兩種解讀，詳參張恩普：〈孟子文學批評思想探討〉，《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2005年），總第217期，頁128；丁文林：〈孟子「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論〉，見《商場現代化》，總第459期（2006年2月），頁229；林維杰：〈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朱熹對《孟子·萬章》篇兩項原則的詮釋學解釋〉，頁117-123。諸文有詳細文獻的引證。

⑫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卷9上，頁2735。

相同於前代詩人之志，亦即人心相同、人情相通的緣故，所謂「人情不遠」。具體地說就是，讀者解讀作品時，藉由設身處地同情理解所得的意，來迎合或逆測詩人的心志。李正治在說明「以意逆志」時曾說：「『逆』字的解釋在古代有歧義，或說迎合，或說揣測，其實其核心義即『設身處地的同情了解』。因為從『意』至『志』這一步的跨越，是從詩的整體意義的理解再反溯作者的情志，這一步追溯，唯有通過『設身處地的同情了解』才有可能。」¹³也因此學（詩）者能以意逆測詩人之志。

又如，朱子解讀孟子「以意逆志」這段文獻時也曾說：

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¹⁴

此中，「文」即「字」，指文字；「辭」即「語」，指語句；「逆」即「迎」，指迎取。而「以意逆志」即「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亦即以讀者自己之意迎取作者之志。朱子在此主要是順著孟子針對咸丘蒙解讀時違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這種斷章取義的弊病，來說明「以意逆志」。另外，朱子在《語類》中又曾對「以意逆志」說進行了補充說明：

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

¹³ 李正治：〈比興解詩模式的形成及其意義〉，見《中國文學新境界》（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頁362。

¹⁴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306-307。

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卻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¹⁵

朱子在此則是針對時人解讀時違犯「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這種先入為主的弊端，來解釋「以意逆志」。「先自立了意後方觀」指讀者先有既定成見再來閱覽書籍。朱子認為這種預存成見的解讀方式在學識上終究是不會有進步與收獲的，這是因為無法看見古人意思的緣故。面對時人這種毛病朱子藉由「以意逆志」來加以對治。就「意」的層面來說，讀者須虛心，心中不自作意思，沒有既定成見；並且要順勢，看書上古人意思收束何方。就「逆」的層面來說，讀者須耐心等待，不主動尋求、捕捉與把握。這是因為若讀者閱覽時主動捕捉作者之志，則是「以意捉志」，而非孟子的「以意逆志」。反之，若要免淪於「以意捉志」的窘境，則讀者要力避主動捕捉作者之志，採取不主動尋求作者之志的策略。如此才是「以意逆志」。

「逆」字既是「等待」。然而前述朱子在解讀孟子「以意逆志」時也曾將「逆」字理解作「迎取」。那麼，「等待」與「迎取」是否為兩相對立的概念？不是，它們可視為「一體兩面」，皆無主動義——等待以迎取。那麼，朱子詮釋「以意逆志」乃是以讀者自己之意迎取作者之志。針對斷章取義與先入為主這兩種弊病，朱子更加強調：虛心等待，順勢迎取。

其次，就作者之意（詩人之意、古人之意）言，譬如吳淇即曾說：

詩有內有外。顯於外者，曰文曰辭；蘊於內者，曰志曰意。此意字，與「思無邪」「思」字，皆出於志。然有辨。「思」，就其慘澹經營言之；「意」，就其淋漓盡興言之。則志古之志，而意古人之意。……。漢宋諸儒以一「志」字屬古人，而「意」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說

¹⁵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見《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00冊，卷11，頁163。

之，其賢於蒙之見也幾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為輿，載志而遊，或有方，或無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詩論詩，猶之以人治人也。¹⁶

前述已言，趙岐詮釋孟子的「以意逆志」當是「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朱子解讀孟子「以意逆志」當是「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歸結而言，他們的理解都是「以己之意逆古人之志」。然而吳淇反對這種見解，理由是後世讀者並非古代作者；既非古代作者，卻以自己之意來解說古人之志，其見解能勝過童蒙多少！反之，為免淪於蒙懂見地，不可以己意逆古人之志。吳淇因而主張後代讀者不能以自己之意逆古人之志。事實上吳淇提出的理由頗值斟酌，關鍵在於：不是古代的創作者這並不意指無法以己意逆古人之志。倘真如此，後人即無法正確解讀出古人的情志，其理解最多只是蒙昧見識而已。

倘若後世讀者不能以自己之意逆古人之志，那麼又該如何面對古人之志呢？吳淇提出新主張：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或者，古人之志可以藉由古人之意探求得到。為何古人之志可透過古人之意而求得呢？吳淇認為這是由於「志」「意」不即不離的緣故，亦即：古人之志不離古人之意，所謂「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具體而言，吳淇認為「意」擁有工具屬性，它是古人之志的載具。換言之，古人之志乃是以古人之意作為載具，而凡是以古人之意作為載具者，皆可透過此載具而尋得，所以古人之志可由古人之意尋求得到。若是，那麼古人之意又該如何尋得呢？吳淇在此段文獻中並沒有明顯提及。然而前述吳淇論及「知人論世」時曾說：「古人有詩、書，是古人懸以其人待知于我；我有誦讀，是我遙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徒誦其詩，當尚論其人。」此中「遙」當指時間上的長遠，那麼，「我」即是後世讀者；「知」當為理解認識；「逆」即求（吳淇所謂「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依此，「我有誦讀，是我遙以其知逆于古人」當指後世讀者以其閱讀的認識理解求於古人之志。那麼，在吳淇的論述裡，「古人之意」「古人之志」之外，實還有「讀者之意」的存在。也就是說，吳淇認為：閱

¹⁶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1，頁49。

讀時讀者是以其心中所得的理解認識求於古人之意；而古人之意又是古人之志的載具，可以藉由古人之意以求古人之志。因此吳淇對「以意逆志」的基本理解乃是以讀者之意逆求古人之意；再以古人之意逆求於古人之志。

另一方面，趙岐與朱子兩人雖然都是以讀者之意逆古人之志，但可以確定的是，朱子在論述過程中也承認「古人之意」的存在，即前述引文的「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依此，朱子當也是以讀者之意來逆古人之意。

至於「意」與「志」間的關係，字書多相互為訓，譬如許慎《說文解字》說：「志，意也。……意，志也。从心音，察言而知意也。」¹⁷又如《大廣益會玉篇》亦云：「志，……意也，慕也。……意，……志也，思也。」¹⁸比較特別的是許慎的說法，他解釋「意」字說：察看語言文字來知曉語言文字的意義。透過語言文字的意義來聽從其心中聲音（「意」字「从心音」）；而心中的聲音就是他的心志（「意，志也」）。在這裡他試圖解釋「意」為何可以表達心「志」，或者心「志」為何可以藉由「意」來表現。此說若是，那麼藉由古人之意是可以逆古人之志。

歸結而言，朱子與吳淇兩人對孟子「以意逆志」說的詮釋基本理路，除「逆」字的理解相異外，雖二實一，殊途而同歸。朱子以讀者之意逆古人之志，但是也承認這中間有「古人之意」的存在；吳淇雖是以古人之意逆古人之志，但在這之前也肯認「讀者之意」的存在。只是朱子強調讀者之意，吳淇更突顯古人之意。換言之，閱讀時如何從讀者之意逆溯古人之志，這中間必須憑藉作品中的古人之意。亦即：透過讀者之意以逆古人之意；藉由古人之意以逆古人之志。先就前者而言，為何讀者之意可以逆古人之意呢？這是由於讀者之意可以通達古人之意的緣故。具體而言，即是閱讀時設身處地、將心比心並同情地理解。次就後者而言，

¹⁷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0篇下，頁502。另亦可參（南唐）徐鉉：《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通釋第20，頁208。

¹⁸ （梁）顧野王著：《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篇上，頁40-41。

為何憑依古人之意可以逆得古人之志？這是「意」「志」不離不即的緣故，作品中古人之意可以呈現古人心聲、心志。

最後，就實際作品解讀言，「以意逆志」的對象不僅是作品的主意與作者的情志，也包含主意與情志的表現這個議題——如何表現——亦即作品的技巧¹⁹。

三、知人論世與杜詩繫年、年譜

杜甫至晚唐時已有「詩史」的稱號，晚唐·孟棻《本事詩》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²⁰杜甫號為「詩史」，²¹這主要與他在詩歌中敘時事有關，譬如，宋·李朴〈與楊宣德書〉說：「唐人稱子美為詩史者，謂能記一時事耳。」²²又如，宋·陳巖肖《庚溪詩話》也說：「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²³因此，杜甫有詩史的名號。²⁴

杜甫在詩歌中敘述的時事包含個人當時之事與唐代當時之事。就前者而言，譬如，宋·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即曾說：「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動息勞佚，悲懼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²⁵杜甫在詩中敘述個人進退悲懼、動息憂樂等等當時之事，這使

¹⁹ 就詩歌而言，「以意逆志」不僅用以解讀杜詩的情志，亦可用以理解杜詩的技法（含句法），諸如黃生《杜詩說》；也可以擴展至唐詩，諸如黃生《唐詩評》中論及唐代詩人的技法（含句法）。

²⁰ （唐）孟棻：《本事詩》，見《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5。

²¹ 關於杜甫「詩史」的稱號與相關論述，可詳參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241-259。

²² 華文軒等編：《杜甫卷》（北京：中華書局，年2001），上編，唐宋之部第1冊，頁150。

²³ （宋）陳巖肖：《庚溪詩話》，見《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483冊，卷上，頁280。

²⁴ 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中國古典詮釋學例說》（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即曾說：「杜詩之箋釋，乃是先有『詩史』的事實為前提，才產生『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方法理論。」（頁8）依此，杜甫因善敘時事而擁有「詩史」的稱號與「知人論世」「以意逆志」關係密切。

²⁵ （宋）蔡夢弼：《草堂詩箋》（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序，頁18。

得讀者在閱讀詩歌時可以瞭解杜甫的身世。就後者而言，宋·魏了翁〈程氏東坡詩譜序〉亦曾云：「杜少號所為號詩史者，以其不特模寫物象，凡一代興替之變寓焉。」²⁶杜甫在詩中也敘及唐代興盛衰敗的變化，這也使得讀者在閱覽詩歌時可以明瞭杜甫身處的時世，在前述這兩個意義上古人稱杜甫為詩史。

何以杜詩多敘時事呢？首先，古人以為這是由於杜甫一生憂勞國事的緣故，清·楊倫《杜詩鏡銓·凡例》說：「杜公一生憂國，故其詩多及時事。」²⁷其次，前人以為這是因為杜甫內心忠義使然，明·唐順之〈鈐山堂詩集序〉說：「杜少陵一老拾遺，偃蹇無所與於世，以其忠義所發為詩，多紀時事，故謂『詩史』。」²⁸因而杜甫詩歌多敘及當時之事。

詩歌若敘及時事，讀者解讀作品時，倘若不能理解作者興詠之事，則恐無法明瞭詩歌意思。孟棻《本事詩·序目》說：「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雖著於羣書，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為《本事詩》，……。」²⁹那麼，讀者為明詩之義，即須將作者興詠之事，充分加以發揮並理解。依此，這種將詩歌創作時所興詠之事及其因果經過等等，與詩歌兩相對照，以追求符合實際、正確理解詩歌的方法，即可稱為本事解讀法。如何尋找詩中的本事呢？就古典詩歌或杜詩而言，即是繫年與年譜。

由於杜甫創作時往往將當時之事呈現在詩歌裡，因此一方面杜甫為後人稱為「詩史」，另一方面若干杜詩可加以繫年。清·董說〈文苑英華詩略序〉亦曾云：「余欲為風雅編年而未成。蓋以詩繫事，以事繫年，以年繫代，古今大略可吟詠

²⁶ (宋)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見《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04年），第77冊，卷51，頁237。原文「杜少號」當為「杜少陵」之誤。

²⁷ (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1986年），頁11。

²⁸ (明)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見《四部叢刊初編集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卷10，頁207。此前，黃庭堅即曾有類似的見解。《潘子真詩話》說：「（黃）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見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頁310。

²⁹ 同註20，頁2。

而見也。……。故（杜）甫之詩並與時事相經緯，而世謂之『詩史』，此編年之略例也。」³⁰此外，清·邵長蘅《註蘇例言》也說：「詩家編年，始於少陵，當時號為詩史。少陵以後，惟東坡之詩於編年為宜。」³¹雖說蘇軾詩歌適合編年，但也肯定杜詩適合繫年。事實上，杜詩可以據以繫年的要件不僅只有時事，也包含：杜詩中載明的時間、年齡、官名、地名等³²。藉由上述這幾個要素，杜詩基本上是可以繫年的。

杜詩若可知其創作歲月與地點，進一步即可依其歲月編定杜甫年譜，甚至在年譜中附以唐代史事。然而，無論是詩歌繫年或編定年譜，其價值至少有三：就個人身世而言，可顯示作者的平生經歷、出處進退與人情聚散；就朝代時世而言，可體現社會國家大事與時世興盛衰敗；就作品與風格而言，可顯露作品創作歲月的歷程與風格變化的軌跡。譬如：

呂大防說：「予苦韓文、杜詩之多誤，既讎正之，又各為〈年譜〉，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為文之時。……。又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³³

仇兆鰲於「杜詩編年」下說：「依年編次，方可見其平生履歷，與夫人情之聚散，世事之興衰。」³⁴

³⁰ （清）董說：《豐草菴文集》，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403冊，卷3，頁692-693。

³¹ （清）邵長蘅：〈註蘇例言〉，見（宋）施元之：《施注蘇詩》卷首，詳《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113冊，頁380。

³² 蔡志超：《杜詩繫年考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26-28。

³³ （宋）闕名：《分門集註杜工部詩》（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年譜，頁60-61。此外，宋·李綱〈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也說：「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時病多，事未能也。故秘書郎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於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梁溪先生文集》，見《宋集珍本叢刊》，第37冊，卷138，頁486。

³⁴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凡例》（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22。此外，（清）楊倫《杜詩鏡銓·凡例》也說：「詩以編年為善，可以考年力之老壯，交遊之聚散，世道之興衰。」（頁11）

由於杜詩具有諸多歷史的成分，有些古人即直稱杜詩即史，明·張懋修〈杜詩不模擬〉下曾說：「杜詩，史也。」³⁵有些古人甚至以杜詩多敘經歷之事，而認為杜詩自身即可視為年譜，明·江盈科曾說：「杜少陵□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戈亂離，饑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歷苦楚，都於詩中寫出。故讀少陵詩，即當少陵年譜看得。」³⁶總言之，杜詩較適於繫年與編定年譜。現存古代第一部年譜當乃北宋·呂大防（呂汲公，1027-1097）為杜甫編定的〈杜詩年譜〉，今人周采泉說：「今世所存北宋人所著〈年譜〉，恐以汲公杜、韓兩〈譜〉為濫觴，則此不僅為〈杜甫年譜〉之第一種，亦為我國所有年譜之第一種。」³⁷此後古人為杜甫編定年譜幾已蔚然成風，僅宋一朝，現存杜甫年譜除呂大防外，另有趙子櫟、蔡興宗、魯訢、黃鶴與劉辰翁等人撰作的年譜。

事實上，杜詩繫年與編定年譜可以說是孟子「知人論世」說下的具體產物與運用結果³⁸。它們深受「知人論世」說的影響。也就是說，孟子「知人論世」說與繫年、年譜之間存有內在思想觀念上的因果關係。茲舉例如下，譬如，清·邊連寶《杜律啓蒙·凡例》即曾說：

杜詩編年紀月，某詩必繫某年，某詩必繫某地，非如他家可以任意倒置。

蓋即其時其地，可以論世知人，非僅流連光景、陶寫性靈之作也。³⁹

這段文獻清楚說明了繫年（含年譜）與「知人論世」說間存有緊密的關聯。邊連

³⁵ （明）張懋修：《墨卿談乘》，見《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3輯·第28冊，卷7，頁105。

³⁶ （明）江盈科：《雪濤詩評》，見《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冊，頁5839。

³⁷ 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外篇，卷3，頁805。

³⁸ 此外，目前一般學界也將「詩歌的編年」視為「知人論世」的具體化，譬如劉誠《中國詩學史·清代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即曾說：「從詩學傳統上來看，詩歌的編年是孟子『知人論世』說的推衍和具體化。……。詩歌的編年化，無疑使詩篇和時世之間的對應關係更加清晰醒目。」（頁182）

³⁹ （清）邊連寶：《杜律啟蒙》（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頁3。

實認為杜詩的編年，甚至杜詩的繫年、繫地，這使得讀者可以知悉杜甫之為人，並論及其世。那麼，繫年與年譜是「知人論世」說這個觀念的呈現；繫年與年譜也是「知人論世」說的具體落實，它們在觀念上彼此相通，乃至相同。又如，明·唐順之〈鈐山堂詩集序〉也曾說：

唐人又為少陵詩譜，以論其世。況公詩所紀當世之國家大事，皆身所歷而自為之者。……。少陵詩譜，以譜一人，則詳於其人，而世繫之。必有譜公之詩者，則公進退隱顯之跡益以明，而世益可論矣。⁴⁰

這段文獻討論者亦年譜（或詩譜）與「知人論世」間的關係。首先，唐順之以為：藉由少陵詩譜的編定，杜甫出處去留、隱沒顯達的跡象線索會更加明顯，而其世事更可討論。其次，詳其人、論其世的具體方法即是年譜（或詩譜）的編製。這解釋了古人何以要編著年譜。也就是說，古人閱讀作品時須詳其人、論其世，具體方式即為年譜（或詩譜）的排編。據此，「知人論世」乃是杜甫年譜編續的重要因素。最後，清·錢泳《歲寒堂讀杜·跋》中也曾說：

讀杜詩者有編年、編體、編類，三者之中，自當以編年為正。……。所謂讀其書，想見其為人，不徒以詞句之工、格律之妙，當時謂之詩史者，亦此義也。⁴¹

錢泳也認為：杜詩的編年，這可使讀者閱覽其書時，想見其為人，而不只是詞句之工、格律之妙而已，這也是屬於「知人」部分。

歸結而言，孟子「知人論世」說與繫年、年譜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知人論

⁴⁰ （明）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見《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卷10，頁207。此中，文云「唐人又為少陵詩譜」，此恐是筆誤，當作「宋人」，主要理由是古代首部年譜乃是宋朝呂大防撰作的〈杜詩年譜〉，目前尚未有任何文獻及相關記載顯示此前唐人已撰著杜甫年譜。

⁴¹ （清）范輦雲：《歲寒堂讀杜》（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第3冊，頁1241-1242。

世」說是因，繫年、年譜即是果。古人閱讀作品時須知其人、論其世，而「知人論世」的具體方法乃是對作品繫年繫地，進而編寫年譜，因此，解讀作品時須先對作品進行繫年繫地並編定作者年譜。在此觀念下，遂逐漸形成（杜甫）年譜編撰的風潮。

無論是「知人論世」說，或是作品繫年繫地、年譜編定，它們背後更深刻的理由乃是為了解讀作品，亦即透過知其人論其世，或者考察作品創作歲月與作者年譜的相關記載，試圖理解作品。分述如下：

一、就「知人論世」而言，譬如，清·張玉穀《古詩賞析·凡例》曾說：

誦其詩而不知人論世，人晦，詩亦晦矣。故詩人平生略節，必與表明。⁴²

那麼，解讀時為避免詩義晦澀不明，而能正確詮釋作品，須知其人論其世，因而必須表明作者一生大略的節操。又如，楊倫《杜詩鏡銓·序》也曾說：「竊謂昔之杜詩，亂於偽注，今之杜詩，汨於謬解，多有詩義本明，因解而晦，所謂萬丈光焰化作百重雲霧者，自非摧陷廓清，不見廬山真面。惟設身處地，因詩以得其人，因人以論其世，雖一登臨感興之暫，述事詠物之微，皆指歸有在，不為徒作。」⁴³楊倫認為倘若嘗試解讀杜甫詩歌的主旨，無論是登臨感興或詠物述事等等，只有透過設身處地、知人論世的方法，始能得到理解。因此，解讀杜詩的要方之一即為知人論世。

二、就繫年而言，宋·董居誼〈補注杜詩原序〉說：

晚歲杜門，公之子鶴過而道舊，出其紀年《補注詩史》一編，蹙然請曰：

「（黃）鶴先人生平嗜此，恨舊注舛疎，補訂未竟，齎志以歿。不肖勉卒先業，餘三十年。……。盍為我序之。」退披其編，詩以年次，意隨篇釋，

⁴² （清）張玉穀著；許逸民點校：《古詩賞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5。

⁴³ （清）楊倫：《杜詩鏡銓》，序，頁8。

冠以〈譜辨〉，視舊加詳。⁴⁴

宋·黃希、黃鶴父子曾完成《補注杜詩》一書，是書並附以〈年譜辨疑〉（或稱〈杜工部詩年譜〉），並以杜詩之創作歲月爲次，宋人董居誼認爲這種藉由杜詩的繫年編次，可以使杜詩獲得解讀。此外，清·浦起龍也認爲杜詩如果沒有編年，讀者的解讀不能正中鵠的，恐流於錯謬，《讀杜心解·發凡》說：「編杜者，編年爲上，……。蓋杜詩非循年貫串，以地繫年，以事繫地，其解不的也。」⁴⁵反之，爲正確詮釋杜詩，須對杜詩編年。另外，張綖也以爲讀者理解杜甫詩意的途徑，必須透過編年方式，據事以求其情志，《杜工部詩通》「開元天寶年間所作」下云：「觀杜詩固必先考編年，據事求情而後其意可見。」⁴⁶依此，理解杜詩之意，杜詩繫年實不失爲一重大且必要的途徑。

三、就年譜而言，譬如，宋·孫德之〈題薛叔容所注杜詩後〉曾說：

蜀人趙次公、師尹二人，號能注詩之意者，然不失之穿鑿，則失之汎濫，未能深愜人意。惟臨川王（黃）希及子再世用力於此，亦如姚察、姚思廉之於梁、陳史也。觀其年譜載，詩以年攷，意隨篇解，頗號詳密。⁴⁷

孫德之認爲趙次公與師尹二人，號稱能注釋杜詩之意，然而所注詩意，若非失於穿鑿附會，即失於泛濫踏駁，不能深合人意。此致使黃希、黃鶴父子兩世用力於杜甫詩歌的解讀。觀看《補注杜詩·年譜辨疑》的記載，杜詩乃依據年份加以考

⁴⁴ （宋）黃希原注、黃鶴補注：《補注杜詩》，見《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069冊，頁3。

⁴⁵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發凡，頁8。

⁴⁶ （明）張綖：《杜工部詩通》（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卷1，頁19。

⁴⁷ （宋）孫德之：《太白山齋遺稿》，卷上，見《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34冊，卷7694，頁172。此外，劉誠於《中國詩學史·清代卷》「詩歌箋注的編年化」下也說：「編纂詩人年譜的一個基本目的，在於提供解讀詩歌的途徑……。杜詩有『詩史』之稱，其作品按年排續編次十分必要。」（頁180-181）

察，詩意隨篇章排次而能為人解讀。那麼，孫德之與前述董居誼的見解極為相似，無論是繫年或年譜，兩人皆認為它們是解讀杜詩的要津。最後，浦起龍《讀杜心解·目譜》也曾說：

訂少陵詩目譜成，客有諗於余曰：「昔先正之緒言，子亦有聞乎？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籍記其筆札者，近於愚矣，牧齋氏之說也；某詩必繫某年，則拘固可笑，長孺氏之說也。吾子畢力於杜，頗指挾諸書之紕繆，而躬蹈兩家之詆訶，不亦與於愚且固之甚者乎？」余應之曰：「有是哉！雖然，子與氏蓋嘗言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昔者汲公、魯、黃諸君子勾稽貫穿，作為〈年譜〉，功亦不細，特其間舛鑿橫陳，有待來者之是正爾。乃議者但襲宋儒論小序之餘旨，交口相誚讓。彼舛鑿之不問而愚固是懲。詎知續年不的則微事錯，事錯則義不可解，義不可解則作者之志與其辭俱隱而詩壞。……。若乃行世諸刻，譜自譜，詩自詩，是謂見譜不見詩。離固雙美，合非兩傷，孰便孰不便，將無同？……。」⁴⁸

首先，浦起龍完成〈少陵編年詩目譜〉後，即有客子前來質疑，若據錢謙益（牧齋）與朱鶴齡（長孺）的說法，錢、朱兩人反省前人杜詩繫年與年譜編定的弊病主要有二：一、就年譜編定言：其無可援據者，則穿鑿杜詩的隻字片言，曲為之說⁴⁹；二、就杜詩繫年言：某詩必繫某年，則流於拘泥而不知變通⁵⁰。客子認為浦

⁴⁸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目譜》，頁 60-61。

⁴⁹ 錢謙益〈注杜詩略例〉說：「後之為年譜者，紀年繫事，互相排續，梁權道、黃鶴、魯訔之徒，用以編次後先，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而籍記其筆札者。其無可援據，則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而曲為之說，其亦近于愚矣。」見《錢牧齋先生箋註杜詩》（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 年），頁 25。

⁵⁰ 朱鶴齡〈輯註杜工部集凡例〉說：「杜詩編次，諸本互異。惟《草堂會箋》，覺有倫理。蓋古律體制，間有難分，時事後先，無容倒置，不若從此本為稍優也。特某詩必繫某年，則拘固可笑。」見《杜工部詩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97 年），頁 83。

氏訂定的〈目譜〉恐亦有此弊端。浦氏對於客子這兩個質疑，在此並未進一步提出具體論述予以反駁。

其次，浦起龍主要是援引孟子「知人論世」說來嘗試解釋何以他要訂定〈目譜〉。依此，「知人論世」說確實是杜詩繫年、編定年譜的重要因素之一；或者，杜詩繫年與纂訂年譜實是「知人論世」說下的具體運用。第三，浦起龍接著提出一個論述，說明編年與解讀的關係。他認為：如果編年錯誤，則讀者在解讀作品時所徵引的史事隨之亦誤；倘若解讀時所徵引的史事違誤，則無法正確解讀詩意；假若詩意不能正確解讀，則作者創作情志與其辭句將一同流於隱晦，此詩即讀壞了。反之，爲了尋得作者創作情志，則須正確解讀詩意；倘欲正確解讀詩意，則解讀時徵引事件須無誤；若欲使解讀時徵引事件正確，則編年須正確。那麼，此段論述的意義至少有二：一、浦起龍認為解讀詩意的必要條件爲詩歌繫年與年譜編定。二、讀者以其意逆作者之志時，須憑藉正確繫年與編定年譜這兩個關鍵，而繫年與年譜又是「知人論世」觀念下的一種反映，那麼，這除了說明「知人論世」是「以意逆志」的要件外，也說明了，詩歌繫年與年譜編定是孟子「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兩說下的具體呈現。清·余成教《石園詩話》對此也曾說：

《少陵年譜》輯自汲公、權道、魯、黃諸家，行本每有異同。浦二田于一千四百五十八首中，各依年月，重加訂定，析置逐卷之前。雖不免于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籍記其筆札之誚；而指事麗辭，察辭辯志，得有所據，以要其會，其功亦不可沒也。⁵¹

首先，余成教認為浦起龍對杜詩繫年與編定年譜，雖不能免於客子之誚讓，然而瑕不掩瑜，他也肯認了：浦起龍功不可沒。其次，余成教在此指出了「志——辭——事」間三者的關係，他主要是試圖補充說明浦起龍〈目譜〉中「志」與「辭」的關係。就創作而言，作者是觸事興詠，詩以言志；就解讀而言，讀者乃是指事

⁵¹ （清）余成教：《石園詩話》，見《清詩話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卷1，頁1751。

麗辭，察辭辯志。單就後者而言，讀者解讀杜詩時，乃是指出作者創作時引發其感觸之事件，並說明事件與作品辭句的連接關係；進一步，察看作品辭句意義，試圖辨別作者的創作情志。現在融通浦起龍與余成教兩人的看法歸結如下：倘若讀者欲逆作者之志（以意逆志），須能正確詮釋詩歌辭句的意義（察辭辯志）；若欲正確理解詩歌辭句的意義，讀者須能指出所徵引的事件正確無誤（指事麗辭）；而指出徵引事件正確無誤乃是透過作品繫年與年譜編定的方式。前文已云繫年與年譜是「知人論世」說下的產物。因此，「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兩說的具體實踐乃是繫年與年譜。據此，杜詩繫年與年譜不僅僅是「知人論世」說的運用，它們也是實現「以意逆志」說的重要方法。

四、以意逆志與杜詩解讀

自從孟子提出「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說以來，「知人論世」是否為「以意逆志」的必備條件；或者，「以意逆志」是否可以單獨使用。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古人（包含杜詩注者）留意的要點。或以為有關；或較不強調。依此，「以意逆志」說實可分為兩種主張：一、解讀時須以「知人論世」作為條件，那麼，「以意逆志」之前，須先「知人論世」；二、解讀時不以「知人論世」作為要件，那麼，讀者可以單獨憑藉「以意逆志」來理解作品。依此，「以意逆志」說可分述如下：

一、「以意逆志」以「知人論世」為要件：「以意逆志」須以「知人論世」為條件，除前述所舉浦起龍與余成教兩人論述外，又有下列諸例：

譬如，清·顧鎮在〈以意逆志說〉一文中曾說：

正惟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問其世為何世，人為何人，而徒啗哦上下，去來推之，則其所逆者，乃在文辭，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烏乎逆之？而又烏乎得之？……夫不論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世將秕糠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世知人，

而後逆志之說可用也。⁵²

顧鎮在此認為：讀書誦詩卻不論其世，實無法知其人；既不知其人，亦無法逆通作者之志。那麼，讀者欲逆通作者之志，則須知其人並論其世。又如，清·方東樹也認為誦詩讀書欲逆知作者之志，須先知其為人（含論其世）。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說：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為學詩最初之本事，即「以意逆志」之教也。若王阮亭論詩，止於掇章稱咏而已，徒賞其一二佳篇佳句，不論其人為何如？又安問其志為何如也？此何與於詩教也。⁵³

從讀詩的步驟而言，讀者須先「知人論世」，然後再「以意逆志」；從理論的角度而言，讀者為逆知作者之志，須先知其人論其世。此外，方東樹於《昭昧詹言》中又說：

求通其辭，求通其意也。求通其意，必論世，以知其懷抱。然後再研其語句之工拙得失所在，及其所以然，以別高下，決從違。而其所以學之之功，則在講求文、理、義。此學詩之正軌也。⁵⁴

方東樹認為：讀詩時，讀者求通曉作品文辭，這是為求通曉作品之意；而求通曉作品之意，須先論其世（含知其人），而這是為了知曉作者的懷抱。而「懷抱」即是「志」的意義範圍⁵⁵。據此，藉由「知人論世」來解讀作品最終的目的乃是為

⁵² （清）顧鎮：《虞東學詩》，見《文津閣四庫全書》，第84冊，卷首，頁368。

⁵³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卷1，頁6。

⁵⁴ 同前註，卷1，頁7。

⁵⁵ 朱自清《詩言志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2年）說：「……『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從這裡出發，便證明了『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但是到了『詩言志』和『詩以言志』這兩句話，『志』已經指『懷抱』了。」（頁2）

了「以意逆志」。換個方式說，讀詩時，讀者為逆知作者的懷抱（「以意逆志」），必須通曉作品文辭之意；而通曉作品文辭之意，則必須知其人、論其世（「知人論世」）。又如，王國維詮釋孟子「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間的關係時，曾提問說：讀者如何能以自己之意逆古人之志呢？或者，讀者研讀作品時如何能不失古人之志呢？它的方法正是「知人論世」。〈玉溪生詩年譜會箋序〉一文說：

善哉，孟子之言《詩》也！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願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術，孟子亦言之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⁵⁶

王國維認為「以意逆志」的方法即在於「知人論世」；而「知其人」的關鍵在於「論其世」。也就是說，解讀古詩時倘若沒有藉由論其世的途徑，是無法知其人；合而言之，如果沒有透過論世知人的方式，讀者是無法以自己之意逆合古人之志。依此，「知人論世」是「以意逆志」的樞紐。歸結言之，顧鎮、方東樹與王國維諸家皆認為：孟子「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皆為讀詩要法，並且，「以意逆志」說的成立乃以「知人論世」說作為要件。

若就杜詩注釋而言，宋代以來，古人基本上乃是藉由「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的進路來解讀杜甫作品，此兩路雖名為二，實則為一。而「知人論世」的具體化即是杜詩繫年與少陵年譜。因此，自宋以後前人即是利用杜詩繫年與年譜編定的結果，來知其為人，並論其世；再藉由其人、其世來解讀作品，逆測杜甫的創作情志。前人編定的杜甫年譜譬如：宋人呂大防〈杜詩年譜〉、趙子櫟〈杜工部草堂詩年譜〉、蔡興宗〈杜工部年譜〉、魯訢〈杜工部詩年譜〉、黃鶴〈年譜辨疑〉、劉辰翁〈杜工部年譜〉；明人單復〈重定杜子年譜詩史目錄〉；清人

⁵⁶ 王國維：《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卷23〈緞林一〉，頁577。

張潛〈杜工部編年詩史譜目〉、錢謙益〈少陵先生年譜〉、朱鶴齡〈杜工部年譜〉、仇兆鰲〈杜工部年譜〉、浦起龍〈少陵編年詩目譜〉、楊倫〈杜工部年譜〉、吳景旭〈杜陵年譜〉；民國間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等等。

此中，有些年譜依帝王之紀年而附列時事；有些年譜則無。帝王紀年可使讀者明瞭作者身處的朝代時世，而附陳時事則可使讀者知悉何年月日發生的世事。亦即：倘若藉由杜詩中敘述的時事、時間、年齡、官名、地名等等訊息，進而考證出杜詩的創作歲月，那麼，即可將杜詩繫於某年，再依此排編出杜甫年譜。據此少陵年譜，讀者可以知其人，暨所處時世；如果少陵年譜又依年歲而附錄時事，讀者即可藉以比對杜甫該年的詩作與時事間的關係，探究理解作品整體辭句，辨識創作情志，此即余成教所謂的「指事麗辭，察辭辯志」。

二、「以意逆志」不以「知人論世」為要件：就杜詩而言，有些古人在注釋杜詩時比較不刻意強調「知人論世」說，不特別著重它的重要性；甚至有時雖亦標舉「知人論世」說，然而其注釋的基調乃是「以意逆志」說。首先，這並不是意指前人對杜甫的為人與所處時世一無所知，他們只是不同時高舉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論世」這兩說為研究的進路，而只是突顯「以意逆志」為研討的途徑。其次，他們並非注釋杜甫全集，而僅是揀選杜甫部分重要詩作加以詮釋而已⁵⁷，這有別於前人注杜全集，往往亦附列杜甫年譜的現象。這兩個即是古人注杜卻不特別強調「知人論世」的原因；甚至，這在杜詩學中也可以視為新的研究方法。現存明、清兩代強調藉由「以意逆志」來注釋杜詩者至少有四家：明人顏廷榘《杜律意箋》、王嗣奭《杜臆》；清人黃生《杜詩說》、吳瞻泰《杜詩提要》。分述如下：

首先，就顏廷榘《杜律意箋》而言，據其書名，本書即是藉由「以意逆志」來箋注杜甫七律，計有一百五十一首，朱運昌《杜律意箋·序》曾說：「疏釋詳

⁵⁷ 譬如，吳瞻泰〈評杜詩略例〉即曾說：「元人單陽元復〈年譜〉，較呂汲公大防為詳。初，欲依單本編年之次，不分古今體，使讀者因其時其地其人，略得公之生平前後次序，不至大有參錯。然此集乃瞻泰一己所得，簡其要以為讀本，非工部全書也，故仍分體，以便於讀，而各體之序次，則本之於單為多云。」見《杜詩提要》（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頁21-22。

明，考據精確，不鉤深，不率意，盡洗嚮淺鑿之弊，一遵子輿『以意逆志』之指，精研所極，往往獨詣。」⁵⁸此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曾云：「《杜律意箋》，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明·顏廷榘撰。……是編取杜甫詩七言律一百五十一首，先用疏釋，次加證引，名曰《意箋》。蓋取『以意逆志』之義。」⁵⁹依此，《杜律意箋》乃採孟子「以意逆志」說來詮釋杜甫的七言律詩。

其次，就王嗣奭《杜臆》而言，其〈杜臆原始〉中即曾表明：孟子讀詩的方法即是「以意逆志」說，而讀者透過「以意逆志」並藉由知其人、論其世的途徑，如此，素來積累的疑惑，多可豁然開朗；前人理解的錯謬迷誤，多可批駁糾正。他說：

「臆」者，意也。「以意逆志」，孟子讀詩法也。誦其詩，論其世，而逆以意，向來積疑，多所披豁；前人謬迷，多所駁正，恨不起少陵於九京而問之。⁶⁰

雖然王嗣奭在此逕稱是藉由「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來解讀杜詩者，然而檢閱其書，是書仍是以「以意逆志」作為詮釋杜詩的基趾，實有別於宋人注杜多論及當時之史事。

第三，就黃生《杜詩說》而言，黃生解說杜詩的方法即是標誌孟子的「以意逆志」說。〈杜詩說序〉云：

古今善說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之為言迎也。……。余以為說詩者，譬若出戶而迎遠客，彼從大道而來，我

⁵⁸ （明）顏廷榘：《杜律意箋》（臺北：臺北市閩南同鄉會，1975年），頁12。

⁵⁹ 詳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集部第5冊，頁79；另亦可參《杜集書錄》內編，頁321。

⁶⁰ （明）王嗣奭：《杜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07冊，頁379。

趨小徑以迎之，不得也；彼從中道而來，我出其左右以迎之，不可也。……故必知其所由之道，然後從而迎之，則賓主歡然把臂、欣然促膝矣，此「以意逆志」之說也。竊怪後之說詩者，不能通知作者之志，其為評論注釋，非求之太深，則失之過淺，疏之而反以滯，挾之而反以翳，支離錯迕，紛亂膠固，而不中窾會。若是者何哉？作者之志，不能意為之逆故也。⁶¹

黃生在此解釋何以有些古人注釋杜詩卻流於錯舛支離呢？他認為這是由於說杜詩者不能正確地以其意去逆迎作者之志的緣故。那麼，讀者該如何正確地以其意去逆迎作者之志呢？黃生指出說詩者必須事先知曉作者經由之路徑；若能知悉作者經過的路線，讀者則能依順作者經由的道路去逆迎他。如此，讀者即能正確地以其意逆迎作者之志。黃生將「逆」字解釋作「迎」意，顯然這是承繼朱子之說而來。然而黃生更加地強調的卻是「道」——方法。這呈現在他解說詩歌（含杜詩）上特別突顯詩法，包含字、句、章法等等。無論是他的著作《杜詩說》與《唐詩摘抄》（又稱《唐詩評》）都是如此。

就《杜詩說》言，黃生既認為古今善於說解詩歌者，莫過於孟子「以意逆志」之法，他亦標舉「以意逆志」來解讀杜詩，〈杜詩說序〉云：「不慧出入杜詩餘三十年，不敢復為之說，唯以我之意，逆杜之志，竊比於我孟子，兢兢免賓主相失之誚。」⁶²黃生進一步又認為學習杜詩，須先能詮解杜詩；而解讀杜詩的關鍵即在於理解杜詩的裝造句法與經營意匠上，〈杜詩概說〉云：「山谷學杜，得其皮毛，不得其神髓；得其骨幹，不得其筋節。其筋節在裝造句法，其神髓在經營意匠。」⁶³據此，藉由「以意逆志」來解讀杜詩，不僅是指：以讀者之意逆知作者之志，亦含括以讀者之意逆測表現作者情志的技法。

就《唐詩摘抄》言，清·劉蓀真序黃生（號白山）所著的《唐詩摘抄》即曾說：「今《唐詩摘抄》一編，黃君白山評注于前，……，且其間每章疏櫛，又不

⁶¹ （清）黃生：《杜詩說》（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年），頁1-4。

⁶² 同前註，〈杜詩說序〉，頁5。

⁶³ 同前註，〈杜詩概說〉，頁12。

拾人牙慧，不傍人牆壁，于時解概從乎略，而惟『以意逆志』，體味乎當日立言之旨，其中詩眼及章句字法，皆出吾心所獨得，而發揮其意趣。蓋皮膚略而腠理通，並作者之精神亦躍然呈露。」⁶⁴綜上文獻，黃生「以意逆志」的對象不僅包含作者之志，也包括表現作者之志的創作詩法，此即所謂「惟『以意逆志』，體味乎當日立言之旨，其中詩眼及章句字法，皆出吾心所獨得」之語。⁶⁵這是藉由「以意逆志」來詮釋古典詩歌或杜詩的新方向。

第四，就吳瞻泰《杜詩提要》而言，吳瞻泰基本上也是憑藉「以意逆志」來詮釋杜詩。《杜詩提要·評杜詩略例》說：

……少陵自道曰「沉鬱頓挫」。其沈鬱者，意也；頓挫者，法也。意至，而法亦無不密。「以意逆志」是為得之。⁶⁶

吳瞻泰在此標舉杜甫〈進雕賦表〉「沉鬱頓挫」之言。從杜甫創作來看，杜甫自言其藉由法來表現其意，亦即透過頓挫正反之道來表現心中沉鬱的情志，這裡的說明著重在杜甫自言有「法」，此可用以補充黃生「知其所由之道，然後從而迎之」兩句，證明杜甫確實心中有「法」的觀念，如此，說詩者始有依順作者創作時從來之道的可能性。接著，吳瞻泰主張藉由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可以解得「沉鬱頓挫」之旨。從杜詩解讀來看，讀者心中之意如何能逆作者之志呢？吳瞻泰雖未多加說明，然而，從上述這段文獻可知，杜甫與說詩者的交集在於「法」上，亦即：杜甫透過「法」來表現沉鬱的情意；讀者則利用「法」來解讀杜甫的沉鬱情志。亦即：吳瞻泰仍用「以意逆志」來解說杜詩，而其解說的樞紐乃在「法」上。翻檢是書，其法仍是字、句、章法等等。那麼，黃、吳兩家詮釋杜詩

⁶⁴（清）黃生等撰：《唐詩評三種》（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頁6。另亦可見黃生：《黃生全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冊，頁9。

⁶⁵黃生以句法詮釋杜詩，另可參蔡志超〈黃生的杜詩句法與詮釋〉，《慈濟技術學院學報》，16期（2011年），頁173-193。

⁶⁶（清）吳瞻泰：《杜詩提要》，頁19。

的精神與方法其基本立場仍是一致的，精神上都是透過「以意逆志」說來解讀杜詩；方法上則是提出「法」的途徑來解讀的杜詩。

值得一提的是，說詩者無論是藉由「以意逆志」、「知人論世」這一路，或透過「以意逆志」這一路來解讀作品，如何能避免詩歌解讀錯舛呢？關鍵在於題目。譬如，清·張玉穀《古詩賞析·凡例》即曾說：

題目不明，則詩意不顯。⁶⁷

倘若讀者不明瞭詩題之意，則詩中主意即無法顯露。今若欲掌握詩旨，即須明白詩題。又如，清·龐塏《詩義固說》也曾說：

詩有題，所以標明本意，使讀者知其為此事而作也。古人立一題於此，因意標題，以詞達意，後人讀之，雖世代懸隔，以意逆志，皆可知其所感，詩依題行故也。⁶⁸

詩歌除了未標明題目與〈無題〉詩外，基本上，詩歌作者往往標定詩題，這主要是因為作者要說明其觸事興詠，因事而發；而作者為使讀者明瞭其緣事而作，所以標明詩歌本意，立有詩題。那麼，題目是解讀作品的要訣，也是理解作品的蹊徑。無論是藉由「以意逆志」、「知人論世」，或者利用「以意逆志」來理解作品，透過題目來詮釋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步驟。

歸結而言，這種用「以意逆志」來理解作品，卻又不以「知人論世」為要件的讀詩方法，由於僅是讀者為了顯豁詩歌的創作意旨，並展示其理解過程，而非追求作者創作時興詠的本事，因此，實屬於推舉介紹的理解方式，而此可稱為推薦解讀法。

總之，解讀杜詩可以有兩種的理解方式：一、「以意逆志」以「知人論世」

⁶⁷ (清)張玉穀：許逸民點校：《古詩賞析》，頁4。

⁶⁸ (清)龐塏：《詩義固說》，見《清詩話續編》，頁729。

爲要件：亦即讀者逆測作者之志時，須以知其人、論其世爲條件。在步驟上，須先對作品進行繫年、編撰年譜，使讀者可以知其人、論其世，接著，再「以意逆志」。二、「以意逆志」不以「知人論世」爲要件：亦即讀者逆測作者之志時，不須以知其人、論其世爲條件，或者不特別強調知其人、論其世的重要。在步驟上，未對作品進行繫年，亦未編定年譜，而是以讀者之意逆測作者之志。值得注意的是，前人注杜有時也著重解讀詩歌的方法，譬如黃生與吳瞻泰兩人的杜詩字、句、章法研究，藉由杜詩技法這個途徑來逆知杜甫創作的情志。

五、結論

孟子的「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兩說是儒家經典詮釋的議題，也是古典詩學的重要論題。古人於論述時亦多所著墨。然而，目前學界卻較少探討「以意逆志」、「知人論世」與杜詩詮釋間的聯繫。

事實上，自宋以降，前人詮釋杜詩的方法，受這兩說的影響甚深。總體而言，古人認爲：讀者爲逆知杜甫創作的情志，須能正確地理解杜詩；讀者爲能正確詮釋杜詩，須能知悉杜甫爲人，並論及所處時世；而知人論世的關頭即在杜詩繫年與編定年譜上。因此，讀者逆知杜甫之志與知其人、論其世的關鍵，即在杜詩繫年與年譜編纂。也就是說，杜詩繫年與少陵年譜不僅是「知人論世」的產物，背後更是「以意逆志」的運用。反過來說，繫年與年譜是臻至「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要津。這解釋了爲何宋代以下注杜者往往多對杜詩進行繫年或編定年譜這個特殊現象。

另一面向，明清兩朝也有揭舉「以意逆志」說來詮釋杜詩者，其中發展的新方向乃是讀者所逆測的對象不僅只有杜甫的創作情志而已，也包含杜甫表現創作情志的方法，這顯示「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的關係似乎也可以不那麼密切；就杜詩而言，藉由「以意逆志」來詮釋杜詩，這方法替杜詩的詮釋拓展了新的空間，這擺脫了「知人論世」的限制，使得在本事解讀之外，爲推薦解讀預留了廣闊的天地。

上述這兩種傳統解讀路徑實可用於詮釋其他詩人的作品，然而，無論是理解

杜詩或其他詩人作品這仍關涉讀者的詮釋對象與詮釋目的。

就詮釋對象而言，作品須有顯而易見、可供辨識時事、時間、年齡、官名與地名等等訊息，以及另有確實無誤、可供查考的史書、筆記、地志與他人著作等等文獻，使得以兩相考核辨證並對作品繫年，編定作者年譜，以作為詮釋的階梯。

就詮釋目的而言，如果欲以詮解作者興詠本事為目的，讀者可採用「知人論世」之法，藉由繫年、年譜所概括的作者成長交遊、生活學思、行跡出處等資訊，與作品兩相對照逆測作者創作情志，而此有賴於繫年考證與年譜編定。假若僅以推舉介紹理解方法為目的，讀者可採用「以意逆志」之方，展示讀者的詮釋進路與解讀歷程，逆測作者創作心志與表現情志的詩法，甚至是透過技法來逆知作者創作心志。倘若欲結合「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兩門徑，就目前言，「以意逆志」須以「知人論世」為條件，亦即透過繫年與年譜來辨查詩句敘述的事件，使作為解讀詩語意義的依據與資源，以逆測作者之志。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梁·顧野王著，《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2004。

南唐·徐鉉，《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98。

宋·黃希原注、黃鶴補注，《補注杜詩》，《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宋·闕名集註，《分門集註杜工部詩》；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宋·陳巖肖，《庚溪詩話》，《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宋·蔡夢弼，《草堂詩箋》，臺北：廣文書局，1971。

宋·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04。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鵝湖月刊社，1984。
- 宋·孫德之，《太白山齋遺稿》，《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宋·施元之，《施注蘇詩》，《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宋·李綱，《梁溪先生文集》，《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04。
- 明·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清·董說，《豐草菴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明·張懋修，《墨卿談乘》，《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顏廷榘，《杜律意箋》，臺北：臺北市閩南同鄉會，1975。
- 明·王嗣爽，《杜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明·張綖，《杜工部詩通》，《杜詩叢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
-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大化書局，1982。
- 清·黃宗羲，《孟子師說》，《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清·錢謙益，《錢牧齋先生箋註杜詩》，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
- 清·朱鶴齡，《杜工部詩集》，《杜詩又叢》，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
-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
-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
-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1986。
- 清·邊連寶，《杜律啓蒙》，濟南：齊魯書社，2005。
- 清·黃生，《杜詩說》，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
- 清·黃生等撰；何慶善點校，《唐詩評三種》，合肥：黃山書社，1995。
- 清·吳瞻泰，《杜詩提要》，《杜詩叢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
- 清·范輦雲，《歲寒堂讀杜》，《杜詩叢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

- 清·張玉穀著；許逸民點校，《古詩賞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清·余成教，《石園詩話》，《清詩話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 清·顧鎮，《虞東學詩》，《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 清·龐塏，《詩義固說》，《清詩話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二、近人論著（依作者筆畫排序）

1. 專著

- 丁福保 2001 《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
- 王國維 1996 《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朱自清 1982 《詩言志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
- 李正治 2005 〈比興解詩模式的形成及其意義〉，收錄於《中國文學新境界》，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吳文治主編 1997 《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周采泉 1986 《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華文軒等編 2001 《杜甫卷》，北京：中華書局。
- 郭紹虞 1981 《宋詩話輯佚》，臺北：華正書局。
- 陳文華 1987 《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蔡志超 2012 《杜詩繫年考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劉誠 2002 《中國詩學史·清代卷》，廈門：鷺江出版社。
- 顏崑陽 2005 《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中國古典詮釋學例說》，臺北：里仁書局。

2. 期刊論文

- 丁文林 〈孟子「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論〉，《商場現代化》總第459期，2006年2月。
- 林維杰 〈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朱熹對《孟子·萬章》篇兩項原則的詮釋學解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期，2008年3月。
- 曾守正 〈孔孟說詩活動中的言志思想〉，《鵝湖月刊》第25卷，第6期，總號第294。

張恩普 〈孟子文學批評思想探討〉，《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 217 期，第 5 期，2005 年。

蔡志超 〈黃生的杜詩句法與詮釋〉，《慈濟技術學院學報》16 期，2011 年。

The Relationship of Zhiren Lunshi and Yiyi Nizhi in the Mencius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Du Fu Poems

Tsai, Chih-Chao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2 principles of Zhiren lunshi (learning about poets by understanding the era in which they live) and Yiyi nizhi (inferring the author's intention of a poem based on the reader's personal impressions) in the Mencius are crucial to traditional classical poetics. However, few studies regarding Du Fu's poems hav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2 principl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u Fu's poetry. Thus,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to fill this gap in the literatu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2 principles (i. e., Zhiren lunshi and Yiyi nizhi in the Menciu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u Fu's poetry by identifying the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2 principles when interpreting these poems. Scholars in ancient China typically interpreted Du Fu's poem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Zhiren lunshi and Yiyi nizhi. Because Du Fu's poems involve narratives of social events, they can be used to compose historical chronicles and compile Du Fu's biographical chronology. Through the chronicles based on Du Fu's poetry and Du Fu's biographical chronology, readers can understand the era in which he lived and learn the

background context of this ancient period. Subsequently, applying Zhiren lunshi provides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for interpreting Du Fu's poems. In addition, although readers intend to interpret the sentiments and themes of Du Fu's poems based on their own perspectives, they must also surmise and conform to his theory of poetry, which he emphasized in his poems.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Yiyi nizhi requires this type of interpretation and conjecture. In summary, composing chronicles based on Du Fu's poems and his biographical chronology concretely apply the principle of Zhiren lunshi, and interpreting Du Fu's poems and exploring his theory of poetry provides a new manner of applying Yiyi nizhi.

Keywords: Mencius, Zhiren lunshi, Yiyi nizhi, Du Fu poetry, interpretation